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 23



语用学

多学科视角

Pragma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英] Louise Cummings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O
193

Pragma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Louise Cumming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534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 多学科视角 / (英) 卡明斯著. —影印本.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7. 2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

ISBN 978-7-301-11597-8

I. 语 … II. 卡 … III. 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3262 号

© Louise Cummings, 2005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2 George Square, Edinburgh

www.eup.ed.ac.uk

The right of Louise Cummings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or sale in China only.

书 名: *Pragma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语用学: 多学科视角

著作责任者: [英] Louise Cummings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597-8/H·17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46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胡壮麟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建立以来的一个新产品,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几年来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名额都扩大了,教材建设再次提上了日程。除组织国内老师自行编写外,从国外直接引进仍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因此本丛书的有些内容对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研究生,甚至业余学习者也有很高参考价值。例如,像有关语料库、认知语言学的著作除外语老师外,计算科学、统计学、认知科学、词典编辑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师生也有一读之必要。

北大版“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的问世是意料中的事。早在2002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西方语言学丛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六卷本《英语语言史》,Robert D. van Valin 和 Randy J. Lapolla 的《句法:结构、意义与功能》,Andres Radford 的《最简方案:句法理论与英语结构》……共七种,在外语界独树一帜。经过两至三年的摸索,经验更丰富了,视野更扩大了。这表现在选题方面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并重,这更符合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有关“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如何运用有关理论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另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全面掌握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固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让高等学校的学生经常站在本学科的前沿,接触本学科的最新成果,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向。这也是保证教材质量,从而保证所培养学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丛书既引进有关学科在各时期的经典著作,更注意引进21世纪的新著。长江后浪推前浪,许多经典著作最初也是以新著的形式问世的,其作者的年龄往往属于新生代。因此,时代意识是本系列丛书的一大特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丛书采取灵活的出版发行方式,既可系统成套出版,也可成熟一本,出版一本。这样,只要国外有好的新著出版,北京大学出

出版社根据该书的质量和国内的需要,及时引进。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尤为重要。我们还认为,这套丛书的建设与广大读者的监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欢迎读者对本丛书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我们更欢迎读者和业内行家向我们推荐有引进价值的著作!

2004年5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导 读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一、关于作者

2005年1月,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推出了Louise Cummings博士的新著《语用学:多学科视角》(*Pragma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作者Louise Cummings现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从事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她的研究范围包括语用学、语言与心智哲学、语言病理学、论辩与推理谬论等领域。至今已在Argumentation, Metaphilosophy, Informal Logic, Journal of Pragmatics等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其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多学科性。比如,她正在从事的一个研究课题“会话失败:语用混乱的作用”(Conversation Failure: The Role of Pragmatic Disorder)就涉及(言语)交际学、病理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此外,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另一本新作《临床语言学:理论与实践》(*Clinic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也体现了Louise Cummings的多学科研究视角。

二、主要内容

第一章 语用学的多学科性

本章是一个概览。作者直接引用了Georgia Green(1996), Marcelo Dascal(1983), Jacob L. Mey(1993)等著名学者的语用观,介绍语用学与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修辞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意在向读者展现贯穿于全书

* 冉永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

的有关语用学的两个重要特征:(1)语用学受益于很多学科,比如(语言)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语用学的概念基础。近年来认知科学的发展为语用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而且认知也是未来语用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语用学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从不同学科那里摄取营养,但是语用学的研究内容与议题并非就是不同信息的简单堆砌。(2)语用学也会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以上特征说明,语用学与相邻学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且相互影响。

在广义上,语用学研究语言交际所传递的各种信息。一方面,这些信息不等于语言形式所编码的常规意义或字面信息;另一方面,这些信息本身也离不开语言形式所编码的常规意义,尤其是制约语言使用的各种语境因素。该定义所涉及的信息、编码、常规意义、语境和使用等本身就隐含了语用学的多学科性。比如第二章“意义论”讨论哲学家的意义分析及其对语言意义研究的影响与介入。第三章“推理”涉及不同类型的推理,同时推理本身也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研究者等关注的重要问题;交际中语言形式的编码意义和解码意义并不等同于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信息,因此必然涉及一定语境下的推理。第四章“关联理论”专门讨论语用学研究中的信息处理方式等。作者认为,语用现象本质上仍是语言现象,只有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它们进行理解。这是Cummings在对语用学进行多学科视角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更好地讨论语用学的多学科视角和学科交叉性,作者首先简要地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含意理论、关联理论等三个语用学理论,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基本内容;并有选择地介绍了指示现象(人称指示、社交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话语/语篇指示等)、前提等重要概念与现象。

第二章 意义论

本章以意义为讨论对象,将意义理论划分为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三类:指称意义观、心理意义观和社交意义观;同时,作者还介绍了语言意义的哲学基础。

意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哲学、心理学、神经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学科都离不开该概念,且有较多相关讨论。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内,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意义观以及意义解读的不同视角,比如语言学中语义学和语用学对意义的讨论就不完全相同,因为意义体现的不是单一的语义组合关系,同时意义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

指称意义观

指称意义观也是一种哲学意义观,强调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

应关系,以波兰数学家、逻辑学家Alfred Tarski的真值语义论和美国哲学家Donald Davidson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为哲学基础。对于“真”(truth)的定义,Tarski真值语义论是以“T约定”(Convention T)的形式表示的:“S在L里为真当且仅当P。”只有当P所表征的条件成立时,对象语言L中的语句S才为真。也就是说,T约定通过目标语句的名称或结构描述代入S,将目标语句代入P而获得,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里的P是语句S在元语言里的解释。元语言是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在Tarski真值语义论的基础上,Davidson发展了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试图解释自然语言的意义。他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它的为真条件,也就是说,当找出了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也就得到了这个语句的意义。在他看来,语言L的意义理论是用元语言而不是L本身来建构的。在类似哲学思考的基础上,语言学研究中就出现了真值条件语义学,其目的在于给出一定语言中语句成真条件的形式化表达。为此,语义学家使用逻辑符号,尤其是谓词逻辑作为元语言来解释语句。真值条件语义学本质上是组合性质的,认为一个语句的语义值(semantic value)是其各组成成分语义值的累加。

真值条件语义学和指称论对哲学和语言学以外的诸多学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的意义观就受到指称意义论的影响,并认为对意义的解释应该说明语言是如何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取得联系的;知识库(knowledge base)中的知识就是通过指称与客观世界相联系的一种表征形式。其次,指称论也是心智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心智哲学家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类的思想是如何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进行联系的,这同样是一个与指称意义有关的问题。另外,一些母语习得研究者认为,指称意义在儿童习得语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对指称和词语延伸意义的习得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儿童的词汇和语义发展。

心理意义观

心理意义观强调心理意义及意义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Noam Chomsky和Jerry Fodor是其两个有影响的代表人物。Chomsky创立了生成语法规论,主张语言能力“天赋论”,即认为人天生就具备语言机能,而非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人的大脑一开始是一块“白板”。因此,自出生之日起,人的大脑中就存在一些概括性的、抽象的语法规则,它们就是人类语言共有的普遍语法。天生的语言机能与后天的语言环境相互作用,使先天的语言系统得到发展,从而出现使用具体语言的能力。Chomsky并不否认后天学习对获得语言能力的作用,但却反对把语言能力完全归结为后天的经验性结果。Fodor赞成Chomsky的天赋论,认为心理语言(Mentalese)是大脑的内在结构,是无法通过学习获得的;Fodor还指出,大脑中的认知系统是由

多个模块(module)构成的,模块是特殊化的、封闭的心理机制,它们各司其职,互相独立。以上思想为认知心理学确立了心理运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心理表征可以通过形式化的方式表示,大脑结构与活动涉及一定的运算规则。

模块论对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心理语言学家将模块论用于失语症和言语障碍症的研究之中,发现不同的大脑区域受损会导致不同的失语症状;同时失语症研究也推动了语言处理模块论的发展。另外,就语言研究而言,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思想在结构上和语句是相似的,有着和语句相似的句法和语义组合结构;另外,思想和语句的表征不同于它们的处理过程,这一差别在人工智能中体现为检索推理过程和知识表征之间的差异。这些都反映了模块论对人工智能的影响。

社交意义观

社交意义观,也叫意义的语用观,强调行为中的意义(meaning in action)。该意义观源自分析哲学,早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的。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实证研究得到了广泛运用。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是研究语用现象的两个不同的路向或方法,它们具有不同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语篇分析源自早期的语言学,主要是将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延伸应用到语篇的分析之中,寻找制约语篇结构的规则。尽管当代的语篇分析日益强调使用真实语料,并将语言分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之中,但仍有学者在努力寻找规则。会话分析具有社会学的特征,源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民族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通过转写真实的会话录音语料,分析人类的会话交际行为,发现规律。如今语篇分析与会话分析的方法都被借用到语用学之中,这也体现了语用学研究的多视角与多学科性。

简言之,第一章和第二章引出相关概念和思想的目的在于扼要回顾语用学的概况与发展,并向读者表明,哲学为语用学奠定了概念基础;认知科学的发展与思想为语用学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并在未来语用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章 推理

推理是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本章讨论三种推理关系:演绎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合成推理(elaborative inference)、会话推理(conversational inference)。其中演绎推理涉及逻辑和语义关系;合成推理涉及心理和人工智能;会话推理与语用关系,尤其与语用隐含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已知或明示信息中提取新的、隐含信息是推理的目的,但在对交际中的目标信息

进行推理时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语用推理受制于语境因素。另外,从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角度探析推理,有助于弄清楚推理对获取一般的语言意义和特定的语用意义之间的区别与作用,这些都体现了意义研究的多学科性。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涉及逻辑和语义关系,是一种基于形式逻辑演绎规则之上的推理形式,可以分为直接推理(immediate inference)和间接推理(mediate inference)。直接推理就是从一个前提推导出结论。例如:

(1) The tree is not dead.

∴ The tree is alive.

间接推理就是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前提推导出结论,这种推理会得出新的意义,也称作三段论(syllogism)。例如:

(2) All cigarette smoking causes cancer.

All cancer causes death.

∴ All cigarette smoking causes death.

另一种演绎推理是从词语的语义(semantic meaning)推导出结论,即利用词语之间的关系得出新的意义,比如互补意义(如equal和unequal)、不相容意义(如above和below)、相同或相近意义(如bachelor和unmarried man),以及上下义关系(如animal和dog),这种推理依靠的就是语言知识。例如:

(3) Kathy is taller than Mary.

∴ Mary is smaller than Kathy.

(4) Joe is a bachelor.

∴ Joe is an unmarried man.

有学者认为,演绎推理在话语理解中所起的作用甚微。但实际上演绎推理,尤其是间接推理和语用推理之间的关系密切,具有相似性。首先,二者都在于推导出隐含在语句之中的意义;其次,二者在推理结构上是相似的,都是通过整合前提中的信息,推导出新的信息。例如,关联理论的创始人Sperber和Wilson认为,话语理解是一个非论证性推理的过程,演绎推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合成推理

在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学家看来,非演绎推理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更大。该推理离不开与语言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然而它们却是演绎推理没有顾及的。合成推理涉及逻辑和百科知识两种成分,百科知识提供语言输入缺乏而逻辑推理必须的前提信息,比如语篇理解离不开合成推理,百科知识的介入可帮助读者理解语句之间的联系,如“搭桥”推理(Clark 1977)就属于此

类情况。例如:

- (5) Mary unpacked the picnic supplies from the trunk. The beer was warm.
The picnic supplies contained beer.

在理解以上的前两个语句时,听话人需要依赖合成推理,通过调用相关的百科知识来建立两个语句之间的联系,第三个语句就是搭桥推理的结果。可见,合成推理主要是在处理语言时将不同语句的意义整合在一起。在合成推理中,百科知识和逻辑规则常常是同时存在的,逻辑规则居于次要地位。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合成推理所涉及的认知过程,如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而人工智能学家感兴趣的是与合成推理有关的知识模型的建构,如计算机在模拟人类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除了词汇、句法和语义信息以外,还需要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中的一系列知识,才能理解语句。

在语用学中合成推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方面,因为该推理可能涉及太多的心理学内容;另一方面,语用学家还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该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合成推理存在于潜意识的语言处理之中,主要是对通过解码得到的语义表征进行补充,即补充语义表征中没有但却是推理所必需的知识。合成推理具有三个主要特点:(1)合成推理中的知识介入有助于听话人建立话语之间的联系;(2)建立联系的过程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3)此类联系是听话人依靠百科知识中的常规关系建立的。例如:

- (6) A: I'm out of milk.

B: There's a shop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一般情况下,商店应有牛奶出售,所以B提到的商店也应该卖牛奶,A可由此推导B的隐含意义:在街尾的商店可以买到牛奶。

会话推理

会话推理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一个语用学概念,因为它涉及会话中的隐含信息,即含意。在“Logic and Conversation”一文中,Grice对含意及其推导进行过较详细的讨论,然而提出的合作原则和含意推导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尤其是获取含意的“过程”,Grice对该过程的认识还显得有些模糊。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尚未就含意的推理达成共识或提出不受争议的合理解释。Sperber和Wilson认为,隐含信息的获取是一个非论证性(non-demonstrative)的推理过程;多数学者坚持,含意的推理过程不是演绎性的,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推理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对此,Cummings进一步介绍了不同学者对含意的不同认识,并指出了含意的心理学基础。

第四章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及其关联原则与运用已成为当代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就本质来说,该理论是有关交际与认知的理论,既是对交际理论的发展,又涉及认知概念在交际理论中的迁入,它用关联原则取代了Grice理论框架下的四条准则(质准则、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是对Grice理论的成功简化,但同时又保留了它原有的解释力。“Grice的各条准则可用关联原则进行替代,在任何语境下说话人提供的信息应尽可能关联,该原则可诠释Grice准则能够说明的所有情况”(Wilson & Sperber 1991a: 381, Cummings 2005: 17)。因此,关联原则不单是针对Grice理论中的关系准则而提出的,而是对该理论的全面发展,它的解释范围自然要大于Grice理论,阐释能力也更强。

关联理论认为,我们可用一条关联原则去取代Grice所提出的四条合作原则,交际双方的交际过程受制于单一的关联原则。说话人总会尽力使自己提供的言语显得关联,因此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这就是关联的交际原则,该原则来自于人类的认知原则,即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该原则可以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对交际起导向作用。最大关联是指在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认知努力之后所获取的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是在付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努力之后所获取的足够的语境效果。在理解话语时,听话人遵循经济原则,总会试图以最少的努力,去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

关联原则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可适用性。关联原则不仅可用于探讨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还可在整体上对认知、认知特征及信息处理的认知趋向进行解释。“我们认为,认知的一般目标就是获取关联信息,且越关联越好”(Wilson & Sperber 1991a: 382, Cummings 2005: 17)。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交际是认知的一部分,关联原则首先是一种认知原则,其次才是一种交际原则,因为交际本身离不开认知。(2)经济性。交际中的信息处理是按照认知付出与取效的路径展开的,它们也是衡量关联性的重要标准,当获取某一语境效果而付出的认知努力超过该效果产生的收效时,话语的关联性就低,甚至不会产生额外的关联性。(3)帮助说话人形成话语并影响听话人对该话语的信息处理,也即当说话人认为有必要提供信息时,他就会尽可能提供关联话语,而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会设想说话人已提供了关联信息。交际中说话人提供的言语,即使看似不够相关,说话人也会认为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且是其他话语不可能实现的;听话人在理解某一话语时,也会认为该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因而会付出尽可能少的认知努力,去获取它的语境效果。

就话语理解而言,关联原则可用以解说多种交际行为与交际效果,以及话语理解时某一词汇或结构的语用充实过程,它是一种交际信息的语用加工过程,比如某一词语或结构在特定语境中语义的扩充、延伸,或语义的缩

小、收窄(冉永平 2005)。例如:

(7) A: Will you join me for lunch?

B: We'll be at the bank for some time.

在表面上,B的应答仅提供了一个逻辑形式,即语义表征,因此话语理解时A需对其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语用充实,比如确定we的指称对象,排除bank的歧义,缩小其使用范围;明确some time的时间所指等。这是信息处理中以语境为基础的特殊化过程,信息接受者(如A)需要利用语言语境、场景信息等可及的语境信息去确定we的指称对象;同样bank中歧义的排除,也离不开关联原则的介入,假设A知道B喜欢垂钓,bank自然会被理解为河岸;如果B是银行职员,bank就不可能被理解为河岸。在一定条件下,bank还可指示blood bank(血库)。类似诠释都是在关联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以寻找关联为目的的过程,而与语境分离的任何意义都会让听话人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从而使该意义失去关联性。另外,当听话人在处理该话语时,还必须对some time的时间指示进行适度解读,因它可指many minutes(几分钟/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可表示many hours(几小时/十几小时/几十小时),假设B想去河边垂钓,它就不可能只表示几分钟。因此,话语理解中词汇信息的类似语用充实必然涉及关联原则。对以上词语进行语用充实后,听话人自然获取了整个话语的明示意义(explicature),如“We'll be at the river bank for some hours”或“We'll be at the blood bank for some minutes”,但该意义不等于特定语境中说话人借此传递的交际信息或隐含意义(implicature)——说话人B拒绝对方A的邀请。这是关联原则制约下最佳关联信息的语用认知处理过程,对信息处理与接受具有重要启示。

Sperber和Wilson推出关联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1)提出一种有关交际的理论;(2)对中枢系统及信息处理的认知过程进行解释。因此,作者分别从交际和认知的角度讨论了关联原则制约下信息处理中的认知付出与取效,尤其是其中有关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假设形成与验证,并从哲学的角度评析了关联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以及信息处理的认知趋向(以最少的认知付出,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以了解其认知简化。这体现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介入。此外,作者也对关联理论的简化论进行了批判。

就话语理解而言,关联理论无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然而,自问世以来,该理论仍不断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与批评。作者也对关联理论进行了质疑。首先,在Fodor看来,大脑中枢的认知过程具有不可解释性,因为科学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全局过程,大脑可以不受限制地调用任何相关或不相关的各类知识,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或预测在假设形成过程中大脑是怎样调用这些知识的。但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关联原则的最终

目的就是想解释人类中枢系统的认知处理过程,因为话语理解的推理和Fodor所说的科学理论建构是不同的,为此我们能够解释人类交际中的认知过程,存在三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交际中人们可用于理解话语的时间是短暂的,在此时间内人们能够调用的语境假设往往具有最小的可及性,而科学家构建科学假设的时间可以很长,因此可以使用的知识可能没有限制;第二,交际中说话人的话语能够帮助听话人的理解,而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自然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三,与科学家的工作相比,交际中的推理只是一种普通的推理能力。但作者认为,关联理论中话语理解所涉及的推理实质上 and 科学理论建构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理解中的推理过程同样也是由假设形成和假设检验组成的。

其次,作者批判了关联理论的科学简化论(scientific reductionism)。第一,在描述推理时,关联理论所采用的消去规则(elimination rule)排除了认知输入和中枢处理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语境因素,从而舍弃了词语的一些意义,简化了对信息的处理。第二,关联理论认为演绎在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而Cummings认为演绎推理本身就带有简化的性质,因为演绎推理的假设前提已经包含了话语理解所需要的信息,但实际上演绎推理的前提不可能包含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所有信息,因而是简化的。第三,关联理论认为假设验证的过程是演绎的,在假设验证过程中,很多与该假设中某些概念有关的因素就被排除掉了,比如通过预测就能够获取的信息,假设验证的过程就会被简化。

第五章 语用学与心智

本章主要讨论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处理模式以及强调心理模块的人工智能。心理的语用学研究和语用现象的心理学探索都十分欠缺。语用模块论与非语用模块论是Kasher (1991)等认知语言学家和Wilson & Sperber (1991)等语用学家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前者主张语用模块观,认为语用现象是模块问题;后者反对语用模块论,认为模块是对非语用能力的正确描写,不过他们并不否认一般的心理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的模块性,比如他们将语言解码的语法过程视为典型的模块化过程,而语用现象则是特殊的认知现象。然而,作者并不认同以上学者有关语用模块论和非模块论的讨论,因为心智(mind)问题的模块视角(modular approach)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早在17世纪,哲学家就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尤其是它获取、储存和传播知识的能力,比如Leibniz (1982)认为语言是人类心智的最好反映,对词语的分析可以揭示语言的理解过程;Hobbes (1651/1996)也认为语言使用能够反映大脑的活动,话语的作用在于将思想转换为语言。

作者讨论了有关心理模块的五条模块假设:第一条是表征假设,即人类大脑中的心理表征同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存在语义关系;心理表征之间是通过形式或句法属性相互联系的。第二条假设是运算假设,即人类大脑的运算是由心理表征的形式或句法属性驱动的,并对心理表征的语义属性反映迟钝。第三、第四和第五条模块假设属于结构假设,第三条假设是整体结构假设,大脑存在各种心智能力,有些能力是先天赋予的,也有的是后天获取的,比如语言能力,不同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人脑中的心智能力是所有能力的基础。第四条假设就是局部结构假设,指出多数心智能力都是认知模块,这些模块具备不同的管辖能力,各司其职,它们都是先天赋予的,是不能再分的基本单位,具有运算的自主性和信息的封闭性。第五条假设涉及认知模块和中枢系统之间的关系,认知模块为形成信念和解决问题的中枢系统提供信息输入。

认知语言学家Kasher主张语用能力的模块性,认为大脑中存在具有语用能力的模块结构,可用公式表述为:语用能力=语用模块(pragmatic module)+语用中枢系统(pragmatic central system)+语用界面(pragmatic interface)。这体现了两个基本特征:(1)语用模块和语用中枢系统之间存在自然关系,言语行为尤其是间接言语行为的出现说明大脑中存在语用模块,负责特定的言语行为,语用中枢系统涉及意向性行为,管辖言语行为的实施与理解;语用界面涉及不同模块(如视觉感知模块、语言模块)和中枢系统之间的交叉,这否定了心智能力是由视角感知模块和语言模块等互不联系的系统构成的观点;(2)语用界面和语用模块之间并非一定存在关联关系。

Kasher以间接言语行为为例,来证明语用模块的存在,他认为语用模块用来处理话语中的句法和语义属性,从而获取话语的字面意义;所获取的字面意义作为假设进入大脑的中枢处理系统,并与说话人交际意图的信念相互作用,有些假设被保留下来,而有的假设则被舍弃;他还以会话含意和礼貌原则为例,说明语用中枢系统的作用,认为在语用中枢系统中存在Grice所说的理性行为原则和有效方式原则,这些原则管辖中枢系统中信念的形成和行为的策划。此外,他还以指示语为例,证明语用界面的存在,指示语的处理涉及语言(语用)模块的输出和感知模块的输出,二者的输出结果作为输入信息进入同一中枢,两种输入信息在其中被整合,这样听话人就能够理解一定语境中的话语。然而,作者对Kasher的语用模块论进行了质疑,认为Kasher提到的存在于语用中枢系统中的信念也存在于其他提供信息输入的模块之中,而理性行为原则在视觉处理中也同样存在,这说明语用模块的功能与特性不是唯一的,难以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心理模块。

Sperber和Wilson等语用学家反对语用模块论,认为语用能力不同于—

般的认知能力,是非模块性的,因此对语用模块说进行了反驳,比如他们指出:(1)语用处理是依赖语境的信息处理过程;(2)语用模块说不能对话语理解中信息的不确定性进行合理解释;(3)语言不是实现交际的唯一手段,还存在非语言交际。模块说源于语言系统对语法或语码的依赖性;如果语用能力是一个模块,就必然存在一种语用代码,这样交际过程就涉及该语用代码的编码与解码。然而,解码不足以保证交际信息的正确获取。例如:

(8) A: Ozzy Osbourne's coming to dinner.

B: I'll bring a bat.

依赖语码,听话人A只能获取话语B的字面意义,而不能确定bat的特定所指,因此需要依赖相关的语境知识,比如有关B的背景信息等,并将该信息与特定语境进行语用匹配。这说明,模块化的语用代码观不足以说明话语理解过程,不存在形式与交际意义之间的绝对等同,更不存在所谓的语用算法(pragmatic algorithm)。再如:

(9) You're not leaving.

(10) Their friendship blossomed.

(11) Two taxis collided and 30 Scotsmen were taken to hospital.

离开特定语境,听话人难以获取例(9)的施事用意,因为它可表示陈述、命令、责备或不满,因此需要进行以语境为参照的判定与选择,显然不能依靠程式性的语用算法。面对喻意性话语(10),听话人需要获取喻体(如development of flowering)和喻指(如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之间的相似性,同样依靠语用算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如,参照语码关系,听话人也不可能对例(11)中前后语段之间的关系进行连接。由此说明,话语并不总是对说话人意图的准确再现,话语理解需要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和听话人的理解结果之间的最大相似,甚至近似,而非语言形式和交际信息之间的绝对等同。另外,非言语交际现象的存在同样说明,语码并非实现交际的唯一手段。因此,反对语用模块说也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反对语言系统的模块论,语用问题涉及认知介入,尤其是认知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选择。

语用现象是一种独特的认知现象,而模块性是对非语用能力的描述,作者赞成Sperber和Wilson的这一观点;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大脑结构是否真是模块化结构,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第六章 论辩与推理谬论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访谈、会话等言语交际中的论辩已被视为一种独特的言语行为。本章主要涉及与论辩(argumentation)有关的语境因素及其作用,并考察论辩中人们是如何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的,作者的目的在于探讨对

论辩和推理谬论(fallacy)进行阐释的哲学和语用学视角,从而体现论辩分析的多学科性。

作者将论证(argument)定义为一组断言(claim),包括前提和结论,前提必须给出结论成立的原因;将谬论定义为推理中的错误,称为形式谬论(formal fallacy),这些错误来自无效的形式逻辑推衍模式,但大多数错误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称为非形式谬论(informal fallacy),论证者可以利用类似谬论,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

长期以来,论证研究主要是沿着形式逻辑的轨迹进行的,语义框架内的论证前提必须为真,根据逻辑值为真的前提,经过有效推理,一定能够得出逻辑值为真的结论。如果一个论证声称其前提为真,但从前提到结论的有效推理却不能满足正确论证的标准,那么该论证就是谬论。随着形式逻辑的发展,论证的概念也随之改变;在认识逻辑(epistemic logic)的框架中,论证者从较多人知道的命题(前提)通过推理得出较少人知道的命题(结论),如果结论比前提更为人所知,那么该论证就是谬论。与论证的语义概念相比,认识逻辑的论证概念更强调论证者在论证和谬论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对话(dialogue)是分析论证和谬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此形成论证的论辩框架(dialectical framework);在此框架中,论证者参照一定的规则,在特定对话语境中与一个或多个对手进行推理和论辩,其中规则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论证概念受到了形式逻辑的影响。在对推理的心理学研究中形式逻辑曾占主导地位,在心理学框架中论证是一种心理现象,推理过程涉及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转换,比如思想、信念、知识等,类似转换是有序的,并遵守一定的内在制约;当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转换不受限制时就会出现谬论。形式逻辑的论证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如Perelman强烈抨击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并提出了论证的新修辞法(new rhetoric);在修辞框架中,论证是论证者之间论辩过程的一部分。论证通常是听话人提出的,如果论证获得了具有理性的听话人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合理的;如果得不到认同,就是谬论。这里的听话人就是论证者希望通过论证来影响的人的总称。Perelman的新修辞法激发了非形式的论证研究,有学者将语用学概念引入论证研究之中,提出了语用论辩(pragma-dialectics),将论证视为一种语篇。论证者从作为观点的命题出发,遵照论辩的规则进行推理,而违背规则的推理就可能导致谬论。

Perelman是首先利用语用学方法来研究论证的学者之一,他将论辩过程中的论证语境化,且充分认识到论辩中论证者的重要性。受他的启发,Frans van Emmeren和Rob Grootendorst提出了语用论辩,认为论证是一种言语行为,和其他言语行为一样也需要遵守Searle提出的一系列构成性规则